

群众路线:历史演进、理论内涵与当代启示

李妍琨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本文系统考察其百年演进、理论内涵、规律镜鉴与当代挑战。研究发现,群众路线在长期实践中,将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调查研究、政策制定等具体方法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领导方法体系。百年间,其理论内核从“人民主体论”递进至“人民中心论”,实践形态从革命动员手段升华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工作路线,最终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获得系统性制度保障。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群众路线需要在拓展媒介的同时坚守认识论实质。本文提炼四条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参照。

[关键词]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论;以人民为中心

[作者简介]李妍琨(2002—),女,河南南阳人,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5001>

[中图分类号] D261.3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逻辑与中国道路独特性的重要线索。从1929年“九月来信”首次提出“群众路线”概念,到1943年毛泽东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再到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将其确立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一理论化进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赋予群众路线新的时代内涵。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带来了全新的认识论挑战:大数据能否替代“从群众中来”的调查研究,线上互动能否替代“面对面”的群众工作,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的正面回应。回应这些挑战,需要回到群众路线的百年实践,从历史演进中把握其理论逻辑。

一、百年演进:理论内核与实践形态的双重升华

群众路线的百年演进有两条交织递进的主线:思想内核从“人民主体论”向“人民中心论”层层深化;实践形态从革命动员手段跃升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工作方法,最终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获得越来越系统的制度保障。

(一)确立与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完成了从经验积累到概念提出、从制度落地到哲学升华的完整递进过程。1927年,毛泽东历时三十余天走访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严厉驳斥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错误论调,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群众工作前置方法,深入乡村、实地调研、倾听底层诉求,在引导群众之前先向群众学习。1929年“九月来信”首次正式使用“群众路线”概念,同年古田会议将其细化为执行规定。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确立了“从群众中来”的方向性转变。1937年《实践论》系统阐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原理,为经典表述提供了直接哲学依据。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完整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双向认识循环,并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45年党的七大将其纳入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将其明确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这一阶段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在于破解了农民占人口多数的东方大国探寻革命依靠力量的时代命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人民战争实践充分

印证了“人民群众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力量”的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路线进入执政场域全新探索。1956年党的八大将“群众路线”概念明文写入党章,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专门区分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两层内涵,并郑重警示,执政条件下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大大增加了”。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群众路线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这意味着执政党的群众路线必须以妥善协调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关系为重心。

群众路线本身包含一对张力:“从群众中来”强调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集中起来”依赖领导机关的理论判断。在常态制度下,调查研究、民主协商等程序性安排为这对张力提供了平衡机制。当制度程序被打破时,“集中起来”可能被主观意志替代,“群众”被抽象化为政治符号。这一教训深刻揭示了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本质区别:前者是以完整认识循环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尊重客观规律、依靠制度化运行是其基本前提;后者则可能在制度缺位时滑向脱离客观规律的盲动。

(二) 分层拓展与新时代升华

此后,群众路线理论内核沿人民标准论、人民利益论、人民本位论的脉络递进深化。

邓小平将群众路线的贯彻质量锚定于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之上,提出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尺,使群众路线从“党如何做”的方法论拓展为“党做得对不对”的价值评判论。政策的正确性不再是党自我认证的结果,而是交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裁决。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将生产力标准落实为人民利益标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典型范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群众路线落脚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它从方法论和作风层面提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成为群众路线在发展领域的集中延伸,将群众路线的价值取向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全流程。

进入新时代,群众路线在理论深化、实践拓展和制度保障三个层面实现系统性升华。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重大定位,系统阐发人民江山论、人民阅卷人等标志性论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群众路线新时代的核心表达,贯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践层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整治“四风”,精准扶贫中数百万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网上群众路线平台构建了线上线下联动格局。制度保障层面,调研、听证、民意征集纳入重大决策法定程序,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制度广泛推广,群众监督、民主评议等配套措施不断完善。群众路线的贯彻有了制度性保障,不再仅依赖于干部的个人自觉。宏观的根本政治制度、中观的程序性制度和微观的基层参与制度层层递进,共同保障人民群众主体作用贯穿于各层次政治过程。

以上百年演进的历史表明,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课题,但其核心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党如何从群众中获得正确认识,又如何将正确认识转化为群众实践。这一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为从理论上分析群众路线的理论内涵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二、理论内涵: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

从百年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可以看到,群众路线在回应中国具体国情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其特有的理论构成。这一构成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面貌,与近代中国的特殊难题密切相关。

(一) 生成的现实逻辑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特殊困境中寻求生存发展的产物。近代中国与西欧、俄国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西欧、俄国革命以城市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列宁“灌输论”具备现实落地条件,先锋队依托城市阵地自上而下输送理论,工人因集中生产具备天然组织基础。而近代中国是农业大国,20世纪20年代全国现代产业工人约20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极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重心被迫转入农村,在几乎没有现代产业工人的环境中,列宁模式的灌输论丧失了基本依托。

土地革命时期,敌我力量悬殊,红军兵员、粮食、情报全部依赖乡村农民供给。党、军队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生存绑定关系,不是党居高临下地教育群众,而是党离开群众就无法生存。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解决土地、柴米油盐等民生小事,才能构筑千百万群众组成的

“铜墙铁壁”。群众的支持靠解决具体问题赢得,而非抽象宣传实现。

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思想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土壤。《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以“君舟民水”喻示民众力量的决定性作用。这种重民认知贯穿中国政治思想史,构成了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文化契合点。然而,传统民本以君主统治为前提,民众始终是政治客体,重民的本质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治术。党必须将“重视民众诉求”的合理内核从君主政治框架中剥离出来,把道德层面的民本诉求转化为制度化工作流程。这种文化层面的创造性转化,正是“第二个结合”在群众路线生成中的具体体现。

固守单向灌输会脱离底层民众,放任群众自发性则会导致革命无序。双重局限之下,必须创造一种兼具引领与学习功能的党群工作新范式,其核心就是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循环替代单向灌输。

(二)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及其意义

从上述历史实践中可以看到,群众路线的理论特色在于,它把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内在结合起来,使唯物史观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原理和具体工作方法形成一个可操作的体系。

第一,唯物史观为群众路线提供了根本世界观的定锚。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921年,毛泽东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不是哲学口号,而是直接转化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政治立场,贯穿于党的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群众路线之所以能与传统民本思想的“重民”诉求相区别,根本上就在于它以唯物史观为基石,赋予“重民”以科学内涵和制度保障,而非依赖统治者的道德自觉。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群众路线提供了完整的哲学依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原理,在群众路线中被具体化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对此作出了经典表述:“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

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群众作为实践的直接参与者,构成认识的来源;党的集中提炼完成从感性经验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群众的再实践构成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先验自足的,必须在群众实践中不断检验和校正。

第三,群众路线发展出一套在东方农民大国切实可行的方法体系。从井冈山时期的土地政策到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主协商到改革开放后的政策试点,调查研究、民主评议、群众监督等制度化程序,使哲学原理落地为操作规范。这套方法论吸收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体恤民生”的合理内核,又以制度化程序克服了传统民本依赖个人道德自觉的脆弱性。

三、规律镜鉴与当代挑战

群众路线的百年实践蕴含着稳定的规律性认识。同时,数字化时代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总结规律、回应挑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

(一)四条规律性认识

百年来群众路线的成败得失,从根本立场、认识方法、价值遵循、保障机制四个维度反复验证着稳定的因果关联。

第一,坚持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党性和人民性不是需要从外部调和的两个变量,而是同根同源的一体两面。在群众路线的具体运作中,这一原则体现为双重负责机制:干部既要对党组织负责,也要对人民群众负责。离开党性讲人民性会沦为尾巴主义,离开人民性讲党性会蜕变为命令主义。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群众工作方法相统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根本上取决于是否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循环。从井冈山土地政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精准脱贫,都是从群众实践中来、经群众实践验证的成果。这种认识论逻辑,正是群众路线区别于其他一切政治路线的核心标识。

第三,坚持长远根本利益与现实具体利益相统一。革命年代,毛泽东要求解决群众从土地到柴米

油盐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满足了群众的需要”,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党的周围。改革开放以来,从“三个有利于”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再到“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是群众路线的物质基础。长远利益指引方向,现实利益提供认同基础,二者不可偏废。

第四,坚持集中性教育与制度化建设相互支撑。延安整风从思想根源上纠正脱离群众倾向,新时代教育实践活动集中整治“四风”。集中教育解决的是“愿意做”的问题。教育为制度注入灵魂,制度为教育提供保障,二者功能互补,是长期执政条件下防止脱离群众的根本保障。

四条规律构成逻辑递进的有机整体:立场确立方向,方法保障正确,价值检验成效,制度提供保障。任何一环缺失,都会导致群众路线运转失灵。

(二)数字化时代的认识论挑战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群众路线带来了全新的认识论挑战。这是百年未遇的新命题,也是本文需要正面回应的理论问题。

在传统群众路线中,“从群众中来”依赖于干部深入基层、蹲点调研、面对面交流。群众分散的经验通过干部的亲身感知和理论加工进入决策循环,这一过程包含了信任关系的建立、情感交流的展开和隐性知识的获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感知民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工具,这在某种意义上拓展了“从群众中来”的渠道。然而,技术手段无法完全替代“从群众中来”的认识论功能。大数据捕捉的是行为痕迹和显性偏好,而非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凝结的深层经验与真实诉求。算法呈现的是统计规律和相关性,而非因果逻辑与实践机理,知道群众“要什么”不等于知道“为什么”,更不等于知道“怎么办”。线上的“键对键”交流不同于田野的“面对面”交流,后者所承载的信任关系、情感交流是数据无法复制的。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强调的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而不仅仅是信息的采集和传输。干部在调研中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式实践。干部在劳动中理解群众的艰辛,群众在相处中建立对干部的信任,这种双向的认识和情感交流,是任何数据采集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因此,在数字化条件下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正确的方向不是用数据替代调研,而是将线上数据作为“从群众中来”的辅助手段和补充渠道。同时

必须警惕数字形式主义,不能用数据报表替代深入群众,不能用信息采集替代调查研究,不能用“键对键”完全替代“面对面”。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核心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这一实质不因媒介变化而改变。数字时代拓展了循环的渠道,但循环本身不能消解。

面向新征程,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的核心要回应三个命题:将群众路线深度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论循环嵌入立法、决策、协商、治理各环节,以制度化程序保障其长效运行;创新数字化时代群众工作形态,以线上数据辅助调研而非替代调研;以党的自我革命保持党群血肉联系,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结语

群众路线的百年演进史完整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历程。群众路线将唯物史观、认识论和具体工作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领导方法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

百年实践证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循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党的事业就能顺利推进;割裂认识循环、脱离群众实际,事业就会遭遇挫折。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群众路线深度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架构,在数字时代拓展群众工作新形态而不失其认识论实质,以党的自我革命保持党群血肉联系,始终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持续展现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6]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7]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

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7.

[8]蔡礼强.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本质属性与丰富内涵[J].甘肃社会科学,2022(1):8-15.

[9]周向军.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及其创造性运用和发展[J].毛泽东研究,2024(2):27-36.

[10]金德楠.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基本历程、主要经验和现实启示[J].社会科学家,2024(6):16-22.

[11]丁辉侠.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印记的来源、生成轨迹与强化路径[J].学习论坛,2023(3):52-63.

[12]程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24):20-22,31.

[13]胡丽娟.从动员群众到以人民为中心——党的群众

路线的发展特征与时代价值[J].观察与思考,2020(11):104-112.

[14]彭琳.从百年党史感悟党的群众路线[J].红旗文稿,2021(8):19-21.

[15]周湘宁,吕增奎.党的百年群众路线的丰富意蕴、历史生成、基本经验考察[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2):59-65.

[16]雷青松.党的群众路线的百年演进及其经验启示[J].长白学刊,2021(6):23-32.

[17]刘红凛.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与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J].江西社会科学,2021,41(5):5-16.

The Mass Line: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LI Yan-kun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46, China)

Abstract: The mass line i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made by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in advanc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its century-long evolutio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underlying regularities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he study shows that in long-term practice, the mass line has closely integrated the fundamental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with concrete methods including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nd policy formulation, thus forming a complete system of leadership methods. Over the past century, its theoretical core has evolved from the theory of the people as the subject to the people-centered theory, and its practical form has been elevated from a means of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to the fundamental working line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finally gaining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support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Facing new challenges in the digital age, the mass line should expand its application media while adhering to the essence of its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regular cognition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mass lin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pistemology; people-centered